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3-15

齐鲁晚报

2021年9月25日
星期六

好
读
书
读
好
书

□美编：陈明丽
□编辑：曲鹏

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，而长安是当时全国的首都、东亚的政治中心，物质文明闪烁、外来文化交融。历史学者徐畅的《长安未远：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》一书，将都城与周边乡村作为整体的“大长安”进行研究，展示了唐朝京畿区域内，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、融合及矛盾、冲突，各阶层民众生产生活、安守流动。她在讲述大唐长安城另一面的同时，对古代的城乡关系进行了剖析，带给今人诸多启迪。

□长庚

由一则墓志说起

《辅恒墓志》收藏于陕西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馆。辅恒(641年—709年)，做过宣德郎、宁州录事参军、上骑都尉，属于唐朝比较基层的文官，在传统的史书上并不值得一提。

辅氏家族所在的雍州三原县，地处长安的京畿之地。所谓“京畿”，就是国都及其附近地区。辅恒青少年时期的事迹，墓志中重点突出了“仁孝”，他分别在8岁和30岁左右为父、母庐墓守丧。此后，直到不惑之年的辅恒仍在三原县务农，一切都平淡无奇。然而，在辅恒43岁的时候，他抓住了一次政治机遇，迎来了人生的转折。

唐永淳二年(683年)是唐高宗统治下的第35个年头。这年年底，唐高宗因为风眩的旧疾急剧恶化，病逝于洛阳城的贞观殿。太子李哲继位，军国大事由太后武则天执掌。

由于唐高宗去世突然，生前并未选定陵址，陈子昂向武则天建议在洛阳近郊筑陵，但武则天最终遵照唐高宗遗愿，任命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“山陵使”，在长安西北的梁山为唐高宗修筑乾陵。

乾陵依山而建，而梁山是石灰岩质自然石山，要在半山腰凿洞建造墓道和玄宫，并建陵园四门、双阙、神道、华表及其他石刻，工程量十分浩大。然而，韦待价临危受命，仅花费了半年时间，就出色完成了任务。

将作大匠亲自监督外，实际负责施工的，还包括工匠、畿内丁防和民众组成的役人群体，辅恒就是其中一员。除了连夜赶作，延长工作时间，辅恒为整个工程中难度最大的玄宫安置贡献了技艺。

《唐会要》记载，神龙元年(705年)十二月武则天驾崩后，给事中严思善曾反对开启乾陵将夫妻二人合葬。在上表中，他透露乾陵墓道有特殊的封闭方法：“乾陵玄宫，其门以石闭塞，其石缝铸铁，以固其中。”由此可见，当初辅恒的设计确实巧妙。

参与施工的人员同心协力，按期完成了乾陵营建，使武则天大悦。除了下令大赦天下、改元外，武则天还重重褒奖了参与乾陵建造的相关人员。借助这一契机，辅恒获得了官职，实现了阶层跃升。

徐畅指出，唐人有门荫、贡举、军功、荐举、辟署等多种入仕渠道，布衣入仕的最主要途径是科举，然而唐朝前期，科举录取人数十分有限。自武德至显庆40年间，进士及第者不足300人，其中贞观时期年均9人，永徽、显庆间年均14人。由于考试录取名额很少，许多人只当科举是黄粱一梦。

辅恒并未通过习学文武而应举入仕，也未从事兵役等冒险事业，仅仅因为参与修建乾陵，便改变了人生的命运，在当时堪称奇



《长安未远：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》
徐畅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新书《长安未远》考据古代城乡生活 大唐都城边的喜与悲

迹。在徐畅看来，这个奇迹的实现，正是以京畿为地理背景。

京畿地区的别样生活

与白居易笔下“家家守村业，头白不出门。生为村之民，死为村之尘”的外州县村民不同，生活在京畿地区的民众，时刻处于变动的社会急流中，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。

京畿临近帝王居所，辖域内有大量的皇帝行宫、国家礼仪建筑、本朝及先代帝王陵墓。因此，皇帝和贵族需要经常踏足畿内，而普通民众则有较多机会入长安，接近统治高层。

与其他地方以农为本不同，京畿乡村民众的营生更加多样化，除耕织、农副业外，多从事工商业。所以，时人评价京畿“去农从商，争朝夕之利；游手为事，竞锥刀之末”，“乐多繁淫，器尚浮巧；稼穡之人少，商旅之人多”。

徐畅认为，导致京畿农人去本逐末的原因，除京畿地区良田有限、赋役繁重，靠农业无法自给自足外，还由于长安城作为人口近百万的大都市，其粮



敦煌壁画中的城郭与郊外(莫高窟217窟主室北壁 盛唐时代)

食、木炭、果蔬、生鲜、建筑材料等物资都要依靠京畿地区的供应，需要有民众从事粮食加工、园艺、养殖樵采等职业。

据唐人刘言史之《买花谣》记载，由于长安城内市场上花卉价格不菲，城南杜陵地区一整村的居民“不田穡”，而是去终南山中寻找花苗，培育后到长安城贩卖。长安以西丰乐乡的民户以种树为业，出现了“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，皆争迎取养”的种树能手郭橐驼。长安城南终南山中木材资源丰富，附近山民多伐木烧炭，运至京城，以此为生。

此外，长安城市的工程建设，如城郭修筑以及寺观、皇宫宅第的营造修缮，大多雇用京畿百姓，导致众多的京畿农业人口脱离土地，从事各类工种。这些在大唐境内的其他区域，都不敢想象。

离长安太近也有许多烦恼。京畿地狭，长安城内更是寸土寸金，除了建造官城、皇城供帝王享用，布局官署、建造坊里让官员、市民居住之外，长安再没有足够的耕地和园林苑囿用地。所以，长安城内的达官权贵，争相到京畿地区建设庄园别业。

长安城内的王公、贵族倚仗权势，强占京畿百姓的耕作用地，如《朝野金载》就记录了唐中宗与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，曾“夺百姓庄园，造定昆池四十九里”。定昆池从长安城南一直延伸到终南山，把长安城郊的山水资源都括入，极尽壮丽。后来韦氏被剪除，安乐公主受到牵连，定昆池无人管理，竟引得“每日士女游观，车马填噎”。

除了与民争地，权贵们还与民争水。唐朝时，关中平原农业、畜牧业发达，人口萃聚，号为天府。农田的灌溉，人、畜饮用等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，环绕长安的河流正是区域用水之源。但由于都城选址于龙首原，地势高昂，想要引外围河流供给长安，是违反“水往低处流”规律的，因此需要为周边河流修建渠道，在渠道上设拦水堰提高水位，才能引导水流灌溉农田，供给民生。

然而，占据京畿田庄的权贵们，为解决本庄用水，经常在渠道上私造碾硐(即利用水力启动的石磨)，加工小麦等粮食，造成供水主渠道中水资源的严重流失，甚至水位下降，无法顺利下行。

唐初开始，这种现象就十分严重。从《唐会要》记载来看，长安城东北的重要灌溉渠道——郑白渠、三白渠上碾硐林立，它们的所有者主要是王公、郡主、寺观、诸僧等。为此，经京兆府、县官多次上奏，朝廷曾屡令拆除渠道上私家碾硐，或归府县收管，但总是屡禁不止。

与此同时，长安权贵们在京畿地区的活动，还会对地方行政秩序造成严重干扰。如宝历元年(825年)春正月，五坊人竟然在鄠县(今陕西西安鄠邑区)境内殴打百姓，“互相牵引，系囚至数十百

人”。按照律法，长安城乡只有府县官和街使、金吾等才有抓捕权，五坊使不过是有宦官身份，就敢滥行抓捕讯狱，气焰可谓相当嚣张。

“非均质集合体”

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这样描述18世纪末革命前夜的首都巴黎：“在巴黎，一切都在沸腾，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，阿瑟·扬在每座城市询问居民打算做什么时，其回答都如出一辙：‘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；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做的。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，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。’”

时人关注巴黎，并非从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其外观，而是以市民及其舆论传布，探知首都社会跳动的脉搏。同理，徐畅认为，对7—10世纪的长安而言，只有把握其人群流动与社会结构，才足以把握帝都特性，乃至把握唐帝国内核构造与运作机理。社会史是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有力手段，《长安未远：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》的价值正在于此。

长安作为世界文明中心，也吸引西域、中亚等各国人民前来；京畿是全国容纳流动人口最多的区域，人口流入量惊人。尽管长安有多面性，但是政治性是其最本质的性格，城内零星的生产所得，远不足以供应这座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精英萃聚之所、户口数在一百万以上的巨型都市。

在徐畅看来，长安的消费性远大于生产性。一方面它的壮丽城池、强健甲兵、丰实仓廩、新样艺文、富足藏书为世界所称道；另一方面，它却只是国家倾尽关中、京畿人力物力所供养的“寄生虫”。“长安以无上的政治权威统御乡村，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，供应并制约着城市，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城、乡统一体。”

珠宝鉴定中有一个专门术语“非均质集合体”，《长安未远：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》借“非均质”来描述京畿的城乡关系。

这种统一体，是不平衡的。具有积极属性的资源，如士族精英、能工巧匠、粮食、物产、财富等，往往由乡村区域流向京城。京城所无法容纳的一些消极属性资源，如豪强、游侠、恶少、逃户、罪犯，则溢出至郊区，为害乡里，造成了“内地边缘”的盗匪型社会。城市的溢出，还包括城市中的精英到乡村，通过经营园林别业、碾硐等水利事业，与乡村区域的本土势力抢夺自然、人力资源，进行权力寻租。

虽然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注意到这种城、乡之间的非均质流动，并在适当时候予以介入，但在长安城与周边乡村天平的城市一边加上重量级砝码的，也正是以首都为权力寄居地的统治者。毕竟在帝制社会里，皇权高于一切。

